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史通全译

[唐]刘知几 原著 姚松 朱恒夫 译注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史通全译

〔唐〕刘知几 原著 姚松 朱恒夫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 (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史通》读法(代序)

程千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的《史通》自来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文心雕龙》总结了上古迄萧齐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史通》则总结了迄唐初史籍撰述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文心雕龙》中有《史传》一篇,概括地叙述了古代史籍的起源和发展。篇中所论,也涉及到了史学的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史通》成书,显然是受到了《文心雕龙》,特别是其中《史传》篇的启发。

《史通》按照先秦、汉、晋撰写子书的传统习惯,分为内、外篇。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纪统》、《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存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多数是主题明确的论文,少数则是一些杂记。它们并非一时之作,而是一篇篇地写成之后,才加以统一编排,区分内外的,如《四库提要》所说:“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它所论及的,几乎关涉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的百科全书,也不算过分。一方面,

书中每篇都有明确的范围和精辟的论点,而另一方面,内外篇之间,每篇与每篇之间,又有互相关联和补充(有时也有矛盾)的地方。

不止于此。刘知几写《史通》,当然是要阐明史学,同时,他也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挾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这一简要的自我评价,事实上也就告诉了后代的读者,《史通》固然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其中却包含了、体现了作者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看法。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刘知几对于史学,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哲学和文学等多方面的精辟见解。

二

我们今天要读《史通》,当然首先要从史学角度着眼。个人认为,要学习这部书,似可将书中篇目按其内容略加区类,分别先后,依次阅读。

首先可以读《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我国史籍起源上古,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史事,《尚书》及甲骨文都可证明。《史官建置》一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编年、纪传两体正史的修撰情况。将两篇合观,就是一部雏型的史学史。先读这两篇,便掌握了古代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大致情况。

其次,可读《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它们都是说明史籍体例的。刘知几按照古代史籍的结构、断限等特点,将它们分成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同时又按其体例分为编年、纪传二体,总称为正史;而将正史以外的各类史籍,共十种,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都归入杂史。这三篇告诉了我们古代史籍体例及目录分类情况,为我们进一步阅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关于史部书籍的评价,提供了方便。

再次,可续阅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这八篇都是讨论纪传体史籍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刘知几虽然认为纪传、编年都是正史,但一因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历史的全貌,二因纪传体自《史记》以下,历代都有成书,未尝中断,所以后来正史之名便为纪传体所专有了。人们所常常称道的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便都是指纪传体的正史。《史通》这八篇,告诉了我们唐以前纪传体史籍各个部分的情状,并探讨了它们的义例得失,使读者对纪传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再次,《断限》、《编次》、《直书》、《曲笔》、《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采撰》等篇则是通论史籍的编撰原则及方法的。

再次,则有讨论史籍文字技巧的各篇,如《叙事》、《浮词》、《模拟》、《言语》、《点烦》等。

以上二十余篇,可以算是《史通》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把它们通读以后,再看其它各篇,也就容易了。

概括地说,《史通》为我国唐以前的史学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发扬了古代史官力求“直书”善恶,使史籍成为符合客观事实的“实录”的优良传统,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为了使得史籍成为“直笔”所书的“实录”,他对史籍的编撰和写作提出了许多有

价值的原则和具体建议。指明了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具的个人修养,即才、学、识三长,而昔人对古代、对圣人的盲目崇拜,他也给予了严正的批判,从而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好坏两方面的样板,使人知所适从。这些都是从史学角度学习《史通》以后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教益。

三

从哲学角度看,刘知几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唯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对于自古以来就混杂在文献中的神奇传说与先秦诸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从事的捏造,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在这方面的意见,《疑古》、《惑经》两篇很有代表性。借助谨严的论证与锐利的笔锋达到了“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目的。

他不但对传统史实与思想加以检查、怀疑与批判,对六经之书、孔丘之言都无例外,而且对史籍中广泛记载的五行灾异、祥瑞符命、神鬼迷信都加以驳斥。古代的神学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故意将一些自然现象(天)和社会现象(人)联系在一起,从而臆造出天人交感的学说。刘知几在《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中,对那些广泛存在于史籍中的乌烟瘴气,逐一扫荡。

除上举各篇能代表刘知几在历史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外,这种思想还贯穿全书,反复出现,如《采撰》一篇,是讨论如何搜集史料的,就明白指出,凡是属于寓言、图讖、传说、神话,都不应作为史料,编入史籍。

当然,刘知几的反传统思想和无神论还有某些不彻底之处,因而其所论述,也往往自相矛盾,但对当时思想界来说,已经闪耀出异样的光辉。

四

《史通》对于文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知几对如何写史,立有若干篇详加讨论,其所获得的结论,大都与文学理论相同或相通。

例如:他在《载文》、《自叙》等篇中,提出了与后代学者“文须有益于天下”相似的主张,推崇那些忠实地反映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文章,而认为“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的作品是“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这在今天也还是文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

在《鉴识》、《核才》等篇中,他反对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盘踞文坛的华靡文风,认为当代所撰史籍,每有“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弊病。在《模拟》中,反对不顾精神实质而仅在形貌上学习古人,事实上是“貌同心异”,只能算是模拟之下。在《言语》中,他反对在语言上贵古贱今,认为一些史家将俗语改成雅语,今言改成昔言的做法十分可笑。在《浮词》中,他更详细地讨论了史书叙事之法,指出“尚简”、“用晦”、“贵真”的重要性。这些涉及写作方式方法的意见,也很可取。

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总的说来,《史通》首先当然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但它在哲学、文学两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所以我们读这部书,可以而且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认识它。

五

《史通》在宋朝就有刻本,明代加以注释的,有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两家。清人则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

浦起龙《史通通释》两家。浦书后出转精，流行很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的学者多在浦书的基础上进行订补。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现附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新版《史通》的后面，很便于阅读。

此外，独立成书的《史通》补注，则有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未刊）及程千帆的《史通笺记》。

吕思勉作的《史通评》，用意在于评议刘书义例得失，并非注释，但和原书对读，很能开人思悟。

解放以后，《史通》很受学术界重视，很多学者写了评介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二）里面，这些文章，都有助于对《史通》的阅读。

前 言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历史编撰体例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它的作者是唐代刘知几。

《史通》写成于唐代前期。它的产生，既是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公元 618 年，李唐王朝建立，经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文治和武功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社会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唐代政权是在隋末的战乱中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唐政权得之于马上。可是，唐高祖也好，唐太宗也好，都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由于帝王的重视，更由于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施行开放的政策，所以文化事业很快兴盛起来。唐代的文化能成为我国封建文化的顶峰和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与初唐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史学作为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立国之始就受到重视。高祖武德五年(622)，即诏修魏、梁、陈、北齐、北周、隋朝诸史。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再次下诏修撰。为了加强对修史工作的领导和控制，特将史馆移到宫城内的门下省，任命宰相为监修大臣。刘知几描述当时史馆的

情况说：“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饌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史通·史官建置》）。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修成，合称《五代纪传》。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撰《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又下令重修晋史，并亲自撰写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人的传论。与此同时，对本朝史的记录和编撰也得到重视，先后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贞观实录》、《则天实录》等。另外，李延寿独自撰成《南史》、《北史》，体现了私人撰史的成就。《史通》的出现，与唐初文化事业的兴盛及对史学得到重视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也要求有《史通》这样的史学理论著作出现。中国史学，有其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成汤时代，就有了史官的设置，出现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典册。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典章制度更趋完善，史官的设置也更加周备。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级需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所以史学进入第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名的历史著作，也奠定了史家“直笔”的传统。到了汉代，以司马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时代，班固《汉书》则开断代纪传体史之先河，成为其后历代正史效法的楷模。至此，我国的史学已经成熟，各种史体基本完备。就内容说，有纪言为主的《尚书》，有纪事为主的《春秋》；就体例说，有编年体的《春秋》、《左传》，有纪传体的《史记》、《汉书》；就所包容的年代说，有通古的《史记》，有断代的《汉书》；就记载的地域说，有国别史《国语》、《战国策》。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但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政权，对史书的编撰始终是重视的，所以史学仍然得到长足的发展，史学领域也得到进一步扩大，除了以反映国家兴亡之迹为主要内容的正史以外，偏记小录、逸事琐

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以及地理都邑等类的历史著作也大量涌现。唐初所修《隋书》，其《经籍志》中所载历史类著作目录有十三类，817部，13264卷。可见史学著作之繁多。不仅如此，修史方法也有了发展，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变得多样，有官修，有私撰，有独创，有续作。修史制度中，有有利于史书修撰的，有妨害史书修撰的；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历史著作就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史学发展到这个时候，就有了很多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答。而在刘知几之前，从理论上对史学工作进行总结说明的只有一些片段的言论，多为对一些具体史书的评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有一篇《史传》，也曾对自孔子以来直至晋代的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撰方法，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但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刘勰“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论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就是说，《史传》篇并不能解决史学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需求。所以《史通》这样的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正是史学发展的必然成果。

二

时代呼唤史学理论家及其史学理论著作，时代也给这个理论家和理论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样的历史使命最后由刘知几承担起来，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刘知几本身具备了承担这个使命的主客观条件。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睿宗景云（710～712）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刘知几因名字与其同音，为避讳，改以字行。所以新、旧《唐书》本传皆作《刘子玄传》。他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终年61岁。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往往源于家学，史学尤其如此，史官就大

多是父子相传。如司马迁就出身于史官世家,其所撰著的《史记》,也是继承其父司马谈未竟的事业。再如《汉书》也是由班固之父班彪先为《史记》续作《后传》,班固在其基础上撰著《汉书》,《表》未成而入狱身死,其妹班昭才续成八表。刘知几对史学的爱好,也有其家学渊源。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和祖父曾分别为北齐和隋的郡县长官,从祖父刘胤之在隋朝时即与著名史家李百药为“忘年友”,唐高宗永徽年间,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清等一起修撰国史和实录,并因此而受到阳城县男的封爵。刘知几的伯父刘延祐,“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勣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旧唐书·刘胤之传》)。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曾在高宗时为侍御史。虽然未曾担任过史职,却颇有良史强直遗风。当时唐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之子卫尉卿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进行弹劾,要他退还。而尉迟宝琳私请皇帝同意止还,再劾再止。于是藏器上书皇帝说:“法为天下悬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新唐书·文艺传》)。刘知几有兄弟六人,皆进士及第,以文学知名,以致于其家乡人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其长兄刘知柔,学识丰厚,品德高洁,累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刘知几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培养了他的品质和学风。他的文学修养,正是来自于父亲和兄长的熏陶。

刘知几的时代,青年士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科举,而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除了经书以外,就是诗赋,所以诗赋、经书是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刘知几也是如此,从很小就开始了家庭教育,而且从文学入门。十岁以后,他的父亲就为他讲

授《古文尚书》。《尚书》记载的是上古的口语,文辞艰琐,很难读懂,所以虽然屡遭鞭挞,学业仍然难进。而在听到父亲为他的几个哥哥讲解《左传》时,他却能听得入神,于是他的父亲根据他的兴趣,开始为他讲授《左传》。本来他的父兄希望他能够在读完《左传》后进一步学习有关《左传》的注疏,以精通此经,便于将来应付科举考试,可刘知几却要求继续了解《左传》以后的历史。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把汉代直到唐初的史书全部浏览了一遍。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古今制度的沿革,历代帝王的承续情况,史书叙事的方法等等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掌握。由此可见,他确实对历史著作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这正是刘知几以后能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的重要前提。

刘知几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进士第,并随之授职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使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对史学作进一步的钻研。于是,在其后的近二十年时间中,他游学京都,广泛借阅各种史书,任情阅读。并把阅读范围扩大到诸子百家、杂记小说。这一来,不仅开拓了他的眼界,而且使他发现了各种不同史籍记载史事的异同之处。刘知几在读这些史籍的时候,有一个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不人云亦云,不被史籍牵着鼻子走,能够发现其中的可疑之处,并有自己的见解,作出自己的判断。如在小时候,读《汉书》,就认为书中列《古今人表》不妥;读《后汉书》,就认为应当为更始帝立本纪,而不应是立传。《史通》中能够商榷古今,剔抉出典籍中大量的不合理之处,不能不说与他的这种敢于疑古责经的精神有关。

武后圣历二年(699),刘知几三十九岁的时候,被调至京都,任右补阙及定王府仓曹参军,参与《三教珠英》的修撰。三年后,《三教珠英》撰成。武则天又下诏令重修《唐史》,刘知几遂调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学实践活动。在此之后,虽然职务数有变迁,但绝大多数时间不离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在此之前，刘知几以数十年的时间，浸润于史籍之中，对史书的社会历史作用及其修撰方法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曾有过把两汉以来，直到唐初所修前代诸史统统重新加以编撰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因为，历史上这样做过的只有孔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又担心“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欲也”（《史通·自叙》）。现在能够进入史馆，参与史书的修撰，把自己对史学的认识和见解付诸实践，这正是他所渴望的事。可是事实却与子玄的愿望相悖，史馆的实际情况使他并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忤时》中对当时史馆修史的状况有所指陈，列举了五大弊端：一是众史官群集史馆，缺乏责任感、紧迫感，互相观望，拖延岁月；二是史官身居深宫，闻见不全，缺乏应有的簿籍资料；三是史馆人多语杂，所记内容容易外泄，所以史官下笔不能无所顾忌；四是设重臣监修，而诸监修则各执己见，一国三公，号令难行；五是监修大臣多不负责任，既不能设定条例，又不指派任务，使修撰者无可遵奉。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实现自己的史学主张，自然感到“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史通·自叙》）。他也不想辞去史职，自行撰述，却又不被允许。于是他一边仍然担任史职，参加修史工作，一边私撰《史通》，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史学见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史通》的产生似乎也有了一点偶然性。然而更主要的还是刘知几的史学修养、史学实践以及他对史学的独到见解，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决定了他能够写出《史通》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史学理论巨著。

《史通》撰成的同一年，唐中宗被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毒死，睿宗即位，刘知几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修国史。当时李隆基为太子，刘知几因名字与太子名音相